

李陵与李陵诗文研究史综述

董 姣

中文提要: 李陵诗歌的研究是“五言诗”研究中的悬案,它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诗歌文本自身的不确定和诗文内容的复杂,而且作者的生平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诗歌的特殊性,本文试图从史学的角度对李陵的历史研究作以梳理,从而归纳出不同时期对李陵人物的评价,并从文学的角度对李陵诗文具体论争的情况作以概述,通过对李陵人物和诗文的研究史梳理,以期找到新的研究的视角。

关键词: 李陵;李陵诗文;研究史;综述

A Summ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Li Ling and Li Ling's Poems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Li Ling's poems is an unsettled cas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five-character poems. The intricacy lies not only in the indetermination of the poem's number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contents, but also in the particular experiences of the author Li Ling which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the research in certain degrees. This paper tries to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Li Ling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thereby deduce the judgements of Li Ling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generalize the specific disputing situation of Li Ling's poems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ture. Through the summation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Li Ling and his poems, it is expected to find a new research angle.

Key words: Li Ling; Li Ling's poems; research history; summation

李陵是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自汉以来,人们对他褒贬不一。对其褒者,将其视为传统忠君思想的叛逆者,是“任人唯亲”军事路线的牺牲品,其诗文是他苦闷心灵的写照;对其贬者,将其斥责为民族败类,其诗文则被看作后人拟作,附加于其名下,为其投降之说辩解。无论在军事史上还是诗歌史上,李陵都是备受关注的历史人物,历来对李陵其人其文的研究甚多,本文拟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对李陵其人的历史研究和李陵诗文的文学研究作以梳理。

一、李陵其人的历史研究综述

对李陵的历史研究,从大的时间段上,可以分为 20 世纪前和 20 世纪以来。

1.20 世纪以前的李陵研究

广义的李陵研究从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李陵事迹见于《史记》、《汉书》,后世历代正史对其事件的征引评述都带有各个朝代不同的评价标准,对李陵人物的褒贬也不尽相同。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就明确表示出对汉武帝灭李陵全家一事的不满,他认为:“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县邈远矣。”这是最早从汉武帝角度对李陵事件进行评价的开始。《南齐书》卷四十八列传二十九中记载了孔稚珪上书反战一事,特举汉武帝发动对匈奴战争,导致卫青李广李陵等下场悲惨的例子,言语中对李陵充满了同情。

李陵是名家子,有勇有谋这是有目共睹的。《北齐书》卷六《帝纪》中记载了孝昭帝读《汉书》至《李陵传》时,“恒壮其所为”的史实,《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徐羨之之传附孝嗣孙君倩传》中,湘东王自愧才不如李陵,《陈书》卷九列传第三《吴明彻传》中有云“李陵矢竭,不免请降,于禁水涨,犹

且生获，固知用兵上术，世罕其人”，可见对李陵的才能赞叹有嘉。明·李贽《藏书》将古人分类列传时依旧把李陵归入“名将”一类，和卫青、霍去病等相提并论。李陵投降，全家被杀，使许多爱才之人感到惋惜，但都把投降一事归结为其兵力不足之上，《隋书》和《旧唐书》都有“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之语。

然而李陵战败投降一事，还是造成了对其人格的损伤，不仅《宋史》继《汉书》记载其“李陵失节，重为陇士之羞”认为“大节固已亏”，而且《南齐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三八《魏虏传》记载本为李陵之后的魏虏甚讳言其是陵后，有言辄见杀，至是乃改姓，可见对李陵投降失节的鄙视。

此外唐·白居易专就李陵败降一事撰文评价。20世纪以前对李陵的研究散见于正史或对正史研读的文章中，多是只言片语，只有白居易《汉将李陵论》是一篇完整的评论性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汉将李陵叛国投敌的行为，同时也连带批评了汉代两个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本文表面上虽充满了封建伦常说教，但实际是对投降叛变的谴责，一再伸张民族气节”¹⁾，对李陵的评价虽然有些偏激，但反映了当代对民族气节的重视。

2.20 世纪以来的李陵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变革和转型，在思想与学术上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对李陵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虽然对李陵的评价仍褒贬共存，但研究角度已经从单纯的史学研究转到政治、文学、历史结合的综合研究，在内容上也从单一的人物评价到对其历史事件的整体考虑，从时间上大体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

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末

这一时期跨度虽然很大，但对李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50年代以前对李陵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到了50年代虽然陆续有文章面世，如佘父的《苏武与李陵》（《国魂》1954年第12期），黄培的《李陵投降匈奴的分析》（《大学生活》1958年3卷11期），李蔚州等的《如何评价〈苏武传〉中李陵这个人物》（《函授教学》1964年第2期），但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与政治结合非常紧密，对李陵的批判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具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是：李文治等的《一纸投敌叛国的无耻辨词——评〈李陵答苏武书〉》（《开封师院学报》1975年第1期）和王开明的《为民族投降主义翻案的一篇反面教材——评〈李陵答苏武书〉》（《思想战线》1976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否认《李陵答苏武书》入手对李陵此文和李陵本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答苏武书》是为李陵投降罪行辩护”，将李陵定位为“千秋的罪人”、“民族败类”，今天看来这样的定性实在有些过重了。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这10年间，中国政治上经历了“拨乱反正”，经济上实施了“改革开放”并初见成效，思想上也经历了一次的大的思想解放，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这一时期对李陵的评价突破了单一的政治评价模式，主张对李陵采取较客观的态度。如周富道《李陵败降的责任在谁》（《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认为“李陵投降匈奴，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李陵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的简单结论，而予以全盘否定，甚至对李陵的正确方面也不敢提

及、不敢肯定，也是不恰当的”，沈淦、钱健《李陵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中也主张“对于他的功过问题，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评定，既要看到他败降失节的一面，又要看到他立下战功和念念不忘报汉的一面”。

此外这一时期对李陵败降的责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认为在李陵投降一事中汉武帝和那些朝廷官员应负主要的责任，这方面的文章有周富道《李陵败降的责任在谁》（《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雷树田《试论李陵及其几首五言诗的真伪》（《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孟庆林《漫谈司马迁〈报任安书〉——兼及李陵投降的责任问题》（《牡丹江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但也有人认为李陵事件的关键还在于李陵本人，司马迁对李陵的赞誉过甚了。主张这一观点的文章以于汇魁的《也谈败降的责任在谁》（《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小犁《李陵的变节行为不值得提倡》（《文汇报》1982.2.2）为代表。

此外倪昭敏的《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对李陵的被俘与投降的时间重新进行了分析，对李陵投降的时间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李陵是在被俘一年多全家被杀以后投降匈奴的”，从而认定“正是武帝以及武帝手下的那一群官僚逼得李陵走投无路”。这一观点是对李陵研究的新见解。

这一时期港台地区还有专著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是台湾作家崔明德的《李陵传》。《李陵传》是从家族史的角度对李陵个案进行研究，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人物传记，也是一部成功的家族史研究著作。此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人物传记译注《李广·李陵·苏武》（胡双宝译注）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武与李陵》（冯惠民编著）是对史书的重新译注。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进入90年代以来，学术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优秀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不仅在学术思维、方法上有所突破，而且各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因此这一时期形成了对李陵研究的新气象。

首先，还是对李陵投降的原因进行分析。进入90年代虽然这一讨论仍在进行，不过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深入和拓展。这方面的论文有：倪昭敏的《论李陵的失败和投降》（《贵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曹希舜《李陵投降管见》（《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芮忠汉《李陵败降应分为假降和真降两个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1期），李恩江《再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是非及汉武帝判以重刑的心理原因》（《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其次，研究的角度和方向大大拓展了，产生了一些涉及李陵多方面问题的优秀作品。

如崔明德《关于李陵研究的几个问题》（《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不仅对李陵奉命出兵匈奴的深层原因和李陵要求“以少击众”的基础进行了分析，而且对后人同情李陵的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张振元《试论李陵的军事悲剧》（《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陵事件定位为军事悲剧，指出酿成李陵军事悲剧的根源是李陵精忠报国的理想、追求与汉武帝的极权意志的冲突，李陵“以少击众”的军事思想与汉武帝“任人唯亲”的军事路线的冲突，进而挖掘出这一事件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和极高的审美价值。郭德茂《悲壮之旅：从李广、李陵到李白》（《丝绸之路》1997

年第3期)是从李广、李陵、李白三个人物的不同的历史遭遇透视出三个人物各自不同的命运悲剧,在这篇文章里郭德茂认为“李陵的悲剧含义比李广更强烈”,感慨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这几篇文章对我们今天从文化和接受的角度对李陵进行综合研究极有启发意义。

此外还有一些对《史记》、《汉书》和人物评论中李陵形象的重新解释,其中以王昭的《读〈汉书·李陵苏武传〉札记》(《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和牟相国《笔锋犀利,浩气干云——读白居易〈汉将李陵论〉》(《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为代表。这两篇文章的观点虽然截然不同,但都是从史学和文学角度阐述李陵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并且都关注到了李陵对后世艺术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王昭的《读〈汉书·李陵苏武传〉札记》分别从《李陵传》的史料价值超过《卫青霍去病传》和《李广传》、朝廷为什么营救李陵、李陵为什么拒绝归汉、李不抑苏不扬现象、李陵引起的困扰、以及《李陵传》对战争类小说和说唱艺术的影响等六个方面将李陵恢复到汉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重新审定了人物的评价标准和人物产生的影响。这篇论文在方法论上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二、李陵诗文的文学研究综述

李陵诗文的研究是李陵人生艺术研究的重要部分,对李陵诗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艺术的角度理解李陵败降的心理和情感,丰富李陵的人物形象,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国中古诗歌的艺术领域。李陵诗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李陵诗歌的研究。李陵诗与苏武诗并称“苏李诗”,因此对李陵诗的研究多是对“苏李诗”的综合研究。“苏李诗”是五言诗作品中颇为复杂的一类诗,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创作系统的总杂不类篇目不定上,同时理论争论的真伪难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其复杂性。千百年来,“苏李诗”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有些观点认为它是李陵、苏武本人所作,但现在文学界普遍认同其是伪作。本文试图对“苏李诗”创作情况进行整理,对其论争情况进行归纳,希望其对“苏李诗”的进一步研究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1. 创作系统的总杂不类是理论争论的根源

(1) 文本的复杂性

文本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对“苏李诗”的争论首先来自于对诗歌内容的研究。在“五言诗”中没有其他的诗歌像“苏李诗”这样,从《文选》收录其诗后,随着时代的延续而篇目不断得以扩充的。而且不仅篇目不定,题目也不统一。

梁萧统在《文选》二十九卷“杂诗类”中录李少卿《与苏武三首》:《良时不再至》、《嘉会难在遇》、《携手上河梁》;又录苏子卿《诗四首》:《骨肉缘枝叶》、《黄鹄一远别》、《结发为夫妻》、《烛烛晨明月》。之后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采《文选》苏武《诗四首》之第三首而另题为《苏武留别妻》。这两本古籍在梁时就出现了名称不统一的情况。针对萧统的选目,后人也评价甚多,如北宋诗人苏轼《答刘沔都曹书》就认为萧统《文选》根本没有明确的选录标准,“……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

之后,《初学记》又载有《李陵别苏武》诗一首,同时《艺文类聚》和《古文苑》又别于《文选》

所载复有李陵《录别诗》八首和苏武《答别诗》两首。《艺文类聚》《古文苑》均为隋唐时辑本，所以到唐时除《文选》所录七首之外，又有此十首题为李陵、苏武的诗歌了。明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将《李陵录别诗》中阙诗《红尘蔽天地》补全。但这首诗在清时冯已苍《诗纪匡谬》中被认定为后人拟作。《古文苑》所载十首别于《文选》的苏、李诗歌，宋章樵在《古文苑注》中就指出其不信为真“苏李诗”。

到了明代，李陵《录别诗》八首，冯惟纳《古诗纪》已明确题作《拟苏李诗》，王闾运《八代诗选》也另作《拟李陵诗》。于是，明沈德潜《古诗源》，清王士禛《古诗笺》等集书都把《文选》所录之诗题为苏、李诗，而《艺文类聚》、《古文苑》之诗皆作伪说，定为无名氏所作。

虽然早在齐梁时就有人怀疑苏、李作品的真伪性，但所见齐梁诗歌辑录之书还都题为苏武、李陵之名，就是到了唐时李善注《文选》诗还多引用苏、李诗句进行注解，因此今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在选录“苏李诗”时依旧从《古文苑》和《艺文类聚》的说法，认定为苏李自著，认为苏轼和章樵的说法是凭空臆断不足为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逯钦立先生在其《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古诗类”中把“苏李诗”具体统计为“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这二十一首诗中不仅包括《文选》、《艺文类聚》、《古文苑》所题为苏、李之诗，认为题为苏武的是该为李陵，还将《文选》中陆机拟诗、曹子建诗及孔融杂诗两首一并考证该为李陵诗而并入其中。至此李陵诗丰富之至也。

（2）由诗文作者的不定引发的猜疑

最早对“苏李诗”作者问题提出疑问的，是南朝或更早一时期的人。学者们一般把它推溯为南朝·宋的颜延之，颜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音。”²⁾也有认为是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这一说法出自杨慎的《升庵诗话》。对这一观点学者们普遍认为是杨慎的误引，郑文在《论李陵〈与苏武〉三首诗的假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 1981 年第 4 期）中对此种说法进行了纠正。

但真正引起人们对“苏李诗”关注的还是起于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他在其中讲到五言诗时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这一评述正如倪其心在《汉代诗歌新论》的引言中所说：“仿佛一潭平静已久的死水，猛然丢进了一块石子，于是波澜再起。”于是后人们对“苏李诗”作者产生了种种疑虑。

《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名疑》（卷三）就指出“称苏李者三，汉苏武李陵，唐苏味道李峤，苏颋李义”。20 世纪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写成较早，中华书局 1936 年出版）也对苏武身份进行了怀疑，并注意到历代评论中对“苏李诗”的评价只言李陵，未谈苏武的特殊现象。之后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东方杂志》1927 年 24 卷 18 期）、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也对此提出了疑义。

逯钦立在《汉诗别录》中通过考查自颜延之《庭诰》以来的诗文评论后，明确指出“世称苏、李诗云者，实仅李陵一人之作是也”，但是他又认为李陵之名不止是西京的李少卿一人独有，而是以少卿最为有名，后人以此组诗附在汉代李陵名下³⁾。不仅指出诗歌的年代非汉代之诗，而且对李少卿的身份进

行了审定。这一论断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多数学者对“苏李诗”的真实性问题持否定态度，认为与汉代李陵、苏武无关。历史上苏轼、洪迈、顾炎武、翁方纲、钱大昕都支持伪说。20世纪“五四”以后由于疑古思潮兴起，李陵书信诗歌更受到怀疑与否定，建国后的文学史都对其持否定态度。尽管早在梁萧统编选《文选》时就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对“苏李诗”的作者及年代的看法，认为：“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⁴⁾之后钟嵘、皎然、严羽等支持其说，但“苏李诗说”一直不占主导地位。

进入20世纪以来，研究汉诗的论著日益丰厚，但研究“苏李诗”的仅有20多篇文章，一部专著，而且大多论著仍以伪说为主，其他或是存疑或是回避。只有古直《汉诗研究·苏李诗辨》和台湾学者方祖燊的《汉诗研究》以考证为主全面支持真说，对伪说进行了一一批驳。论文中雷树田《试论李陵及其五言诗的真伪》（《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王清淮《苏李诗辨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章是新时期八九十年代主张恢复李陵名誉，重论苏、李诗歌真伪问题的主真之作。

综上所述，苏、李诗歌的争论是随着作品的增加，时代的延续渐受怀疑否定的。在梁之前未受疑问，齐梁之时只是怀疑，唐宋以后拟作之说遂起，从而引起了千百年来的学术争论。

2. 论争的具体情况

(1) 语言

很多学者注意到苏、李诗歌的抒情性，诚如刘熙载《艺概》曰：“李陵赠苏武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事实。”因此古今学者抓住了诗歌语言的这一特点，对其不合事实之句进行分析，为其伪说立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7年版）列出苏、李诗可疑之处七八条中三条便是针对语言提出。具体为：（3）《容斋随笔》卷四说：“予观李诗云：‘独有盈殇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5）《文选旁证》翁方纲论“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二句曰：“苏、李二人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8）苏轼《答刘沔都曹书》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而统不悟。”

此外逯钦立《汉诗别录》⁵⁾从苏、李诗的习俗、品目以及“中州”、“清言”词句的运用等方面认定这组诗实为东汉末年文士所作，而非西汉之文。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也从诗歌语言、文风的差异性上认为身为武人的李陵写不出抒情性这么强的诗歌。作为唯一一部专门研究“苏李诗”的著作《苏李诗制作时代考》（马雍著，商务出版社，1944年）则从词类、句法、意境等方面论证了“所谓苏李问答早则不越建安，晚亦不过东晋”。

触讳之说，不合事实等观点可不可以作为证明“苏李诗”为伪作的依据，古直《汉诗研究·苏李诗辨》（启智书局，1933年版）、方祖燊《汉诗研究》（台湾中正书局，1969年）等都对触讳说等一一进行了批驳，指出汉代有“临文不讳”的可能，不仅在汉代的著书中，甚至民间谚语中触讳现象也时有发生，触讳之说不足为据。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

1998年第2期)不仅对否定派说法给予反驳,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而且还对否定派考证方法本身进行了怀疑。

两种对立观点的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多面的研究视角。

(2) 文献的记录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而饱受人间之耻,“发愤著书”而成《史记》,太史公与李陵关系并非一般,然《史记》中却未有李陵之作。《汉书》之中虽仅有一首“径万里兮渡沙幕”的楚歌体的诗,却未录《文选》选目之诗。李陵集,唐后无传,只在《隋志》中有“汉骑都尉李陵集二卷”简短的文字记载;《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三百一十四篇”歌诗,仍然找不到“苏李诗”的痕迹,李陵当世颇有权威的两本书都未录其诗,可见甚为可疑,所以郑振铎《文学大纲》云:“苏李诸作,虽见于《文选》,然《汉书·苏武李陵传》中并不载苏、李二人之诗,……《艺文志》中亦不言陵及武有诗篇。当时,苏李的故事,盛流传于知识界及民间,果苏李作有这许多诗,班固当然不会不知,既知,也不会不录入传中或载入《艺文志》中的。”⁶⁾

对史书记载的深信不疑,促使许多学者将史料的内容与诗文本内容进行对照,提出许多疑点,如《文选旁证》引翁方纲之言曰:“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经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上河梁’三事。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别离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词矣。”

但是支持“苏李诗”说的学者却认为《史记》、《汉书》未收不足为奇,因为“细审《史记》、《汉书》所记所录均是对历史事件的发展或个人的命运起过重大影响”⁷⁾的事件,同时《艺文志》中多是“汉武帝时乐府收入的歌诗”、“多是皇帝贵族作品及各地民歌俗谣”,“苏李之抒情诗不录也属正常”⁸⁾。史书的记载和流传的确受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单凭文献的记录就否定李陵苏武诗歌的真实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古直《汉诗研究·苏李诗辨》在否定“不切当日情事”之辞时则认为“案:史以记事,载诗不过偶然,以史所载者为真诗,反是则否,则自古迄今,真诗亦仅有矣”。⁹⁾

(3) 五言诗的起源

“苏李诗”的研究对五言诗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要弄清五言诗的起源,必须弄清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是是否起源于枚乘,一个是是否起源于李陵,一个是是否起源于班婕妤”¹⁰⁾。因此以往关于五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一直伴随着对“苏李诗”的研究。钟嵘在梁时就提出“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之说,之后又有任昉、萧统、白居易等支持,然而由于史料缺乏,对“苏李诗”真伪和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很难得到肯定的判断,至今仍是悬而未决。

否定五言诗起源于“苏李诗”的观点大多集中在认定“苏李诗”伪说上,如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收录于《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就以苏轼、翁方纲等说法为证据认定《文选》所录七首诗绝非苏李作,因此五言诗也不可能起源于苏、李诗。

这种论证的方法遭到曹道衡的质疑,他说:“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认定‘枚乘诗’和‘苏李诗’是

伪作的根据在于其诗体不似西汉；判定西汉不能产生这种诗体的前提又是相传的‘枚乘’、‘苏李诗’乃后人伪作。这种论证方法至少在逻辑方面是不够严密的。”¹¹⁾

同时，坚持认为“苏李诗”不是伪作，主张以更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些诗歌，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分析五言诗起源的也大有人在。倪其心《汉代诗歌新论》、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就持此观点。台湾学者方祖燊在其《汉诗研究》中专列一章对汉五言诗内容一一进行了重新考证分析，有力地维护了“苏李诗”在五言诗中的地位和真实性，对“伪苏李诗”说进行了反驳。

尽管关于苏、李诗的真伪，至今也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对苏、李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诗歌内在的文学魅力及真伪双方却统一了意见。如否认苏、李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就是因为苏李诗体成熟，是五言诗中的典范之作，“其诗天成”。认为“苏李诗”为真的学者则倍加推崇其独特的抒情艺术。

然而对苏、李诗歌艺术价值的研究却很少。20世纪以前对苏、李诗艺术的评价虽然很多，但都集中于诗话中，如钟嵘在《诗品》中就给予了李陵诗极大的殊荣，他认为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陆时雍《诗境总论》认为“苏李赠言，何温而戚也，多唏嘘语，而无蹶蹙声。知古人之气厚矣，古人善于言情，转意象于虚圆之中，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对李陵诗也推崇备至。但20世纪以前对李陵诗歌的艺术研究却没有专论出现，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20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仅有刘毓庆的《苏李古诗的革新意象》（《晋阳学刊》，1991年第4期）。从题目上虽与苏李诗歌艺术价值有关，但内容上只涉及到《古诗十九首》。此外台湾作家叶庆炳《晚明轩爱读诗：死当长相忆（苏武别诗）》（载台北中华日报，1978年12月25日），方瑜《中国情诗中的一块璞玉（苏武“别诗”）》（载台北中国时报，1984年6月8日）是两篇研究苏武诗歌的，而未论及李陵诗歌。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只有台湾学者柯庆明在《试论汉诗、唐诗、宋诗的美感性质》¹²⁾一文在以离别主题的作品为例，对比分析了汉诗、唐诗与宋诗的不同美感特质时，将李陵诗别离主题的艺术性作了较细致的分析，使其独特的艺术美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

除了李陵别诗受到争议外，被《文选》选录的另一篇李陵的《与苏武书》也同样受到古今学者的关注。这一篇不仅在内容风格上产生了诸多争论，其思想性也受到了非议。

最早对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异议的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己，他在《史通·杂说下》中从风格文体判定此文不像西汉的作品，该为后人拟作，但对其内容并未贬低，还认为是“词采壮丽”。到了宋代苏轼《与刘沔都曹书》就全盘否定该文的作者和艺术价值了。之后清代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均认为其为伪作，虽然清代吴楚材、金圣叹等人坚持李陵所作，但近现代以来，伪说已为学术界肯定。当代学者程千帆先生在他的《史通笺记》中，引用黄廷鉴、章学诚两人的论述，并称“二氏之说，皆能洞烛隐微”，也肯定此文是伪作。

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辞海》等都明确表明该文系后人拟作。并且在70年代李陵《与苏武书》的思想性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具有代表性的两篇论文是：李文治等的《一纸投敌叛国的无耻辨词——

评〈李陵答苏武书〉》（《开封师院学报》1975年第1期）和王开明的《为民族投降主义翻案的一篇反面教材——评〈李陵答苏武书〉》（《思想战线》1976年第3期）。

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在理论和思想上都有了突破，逐渐从新的角度认识作品，虽然仍认定为伪作，但文章的艺术价值逐渐被认识，如艺舟的《远托异国 昔人所悲——读〈李陵答苏武书〉》就对其细致的描写和抒情进行了分析。此外，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是新时期惟一一篇主张重论《答苏武书》真伪问题的文章，显示了当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深度。

随着对李陵诗文研究的不断深入，及在不同时期对李陵诗歌接受程度的考察，我们发现《文选》选录的三首李陵诗更接近汉诗的本来面目，后来不断增加的诗歌与《文选》选录的诗歌就已相差很远，伪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由于受文献材料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目前还很难找到具有绝对说服力的证据来判断作品作者的真伪。

虽然有关李陵诗文的诸多问题悬而未解，但他们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足让后人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李陵诗歌为什么会不断被添加，齐梁时期诗歌的真伪性就受到怀疑，为什么还会有人不断发现题为李陵的诗歌，而且不断应用甚至拟其作、引其义，“河梁”之作究竟有什么魔力吸引众多文人去吟咏慨叹，李陵一个在历史上倍受唾弃的降臣，为什么他的诗文却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他在文人的心目中又是怎样的形象，后世的文人士子们又从李陵及李陵诗文中得到了什么呢？每一个疑问都需要我们对李陵其人及李陵诗歌作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这样才能通过现象透视出诗与人结合产生巨大影响之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注释：

- 1) 参考王汝弼《白居易选集》说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2)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三）卷586，中华书局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1988年。
- 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336-337页。
- 4)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 5) 见《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3页。
- 6) 郑振铎：《文学大纲》（一），《郑振铎全集》第1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
- 7) 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 8) 方祖燊：《汉诗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第55页。
- 9) 古直：《汉诗研究·苏李诗辨》，启智书局，1933年，第65页。
- 10) 郑文：《论李陵〈与苏武〉三首诗的假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 11) 曹道衡：《苏李诗和文人五言诗》，《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 12) 见柯庆明：《中国文学的美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217页。

作者简介：

董姣（1979—），女，辽宁辽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古代诗歌研究02级硕士研究生。